

存在的狀況，一個具有貨幣和信用交易的均衡享有較高的福利水準，因為在該經濟體中，多了一項工具來解決交易障礙。

此外，我的研究興趣也擴及於貨幣史與銀行擠兌等金融理論。我在 "Taiwan's Big Inflation, Stabilization, and U.S. Aid" (未發表) 討論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生惡性物價膨脹的原因，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內涵，以及美援對遏止惡性物價膨脹的貢獻。這篇文章是與吳聰敏教授合作的。而 "Bank Runs in a Laissez-faire Banking System without a Commodity Money Standard: Chinese Experience (1856-1932)" (未發表) 一文則與林向愷教授合寫。這篇文章討論中國錢莊業如何發展出一些機制與組織來增加人們對錢莊經營的信心，如何應付擠兌與金融危機等問題。



李怡庭

學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貿易系學士(1987)、經濟學碩士(1989)

美國賓州大學經濟學博士(1995)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研究助理(1989-1990)、講師(1995-1997)、兼任副教授(1998- 迄今)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1995- 迄今)

彈詞小說與清代婦女文學

胡曉真

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筆者所提出的研究成果為三篇系列論文，皆以清代彈詞小說為討論中心。筆者對彈詞小說的興趣，可溯自在臺大總圖瀏覽中國古典小說的經驗。這一批大抵以七言韻文行文的敘事作品可以算是小說嗎？是怎麼產生的？在中國傳統敘事文學中佔什麼地位？為什麼作者似乎很多是女性？當時在閱讀中產生的隱約疑惑，其實已引發日後研究彈詞小說的契機。在這幾年來的研究過程中，我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並且發現彈詞小說在中國敘事傳統中實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必須及時以專題進行研究。同時，由於女性作者與讀者的介入，彈詞小說與清代婦女之間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因而使得彈詞小說研究超越文類研究的意義，而牽涉到婦女文學史與文化現象的考慮。

這三篇論文雖然都處理女性創作的彈詞小說，但筆者的用意，並非單純的發掘被遺忘的作品，而是要藉由精讀作品，重建清代女性文藝生活的一個面向，並探觸其與社會全體的互動關係。因此，筆者研究的策略是分別以內緣／外緣、形式／內容、文藝／社會等視角反覆探索彈詞小說及其相關現象。由於各篇論文探討的重點不同，以下筆者將分別簡要介紹。

1996年的〈女作家與傳世慾望－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自傳性問題〉一文，處理的是女性作者的創作慾望與主體性建立的問題，所討論的文本是《玉釧緣》、《再生緣》、《筆生花》三部彈詞小說中的作者自敘。在中國自傳文傳統中女性大體缺席的情況下，這幾部作品的女性作者利用情節間夾插的方式從事自我呈現，於是成為可貴的女性自傳資料。筆者在本文中處理女作家如何借用彈詞小說所謂「數花名」的特殊形式成規，留下創作過程的軌跡，甚至洩漏自己的私密生活，從而塑造出不

同於史傳標準女性形象的女性主體。在方法學上，則就廣泛的自傳學理論以及晚近對女性自傳傳統的關懷出發，一方面檢討中國傳統的自傳觀念，一方面引進西方自傳學的理論發現，但主要的意圖卻是突顯彈詞女作家自傳的特有風貌，例如對生活細節的重視、對「寫作者」這個身分定位的執著、對婦職與個人理想之衝突的反省等等。

筆者發現這幾部作品中的自敘部分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都與作者的個人意識有關。《玉釧緣》首先借用數花名成規來作自我陳述，她對季節、天候、景色等等的記錄都被後來的彈詞女作家直接繼承。此外，作者不斷強調創作過程，不但洩漏自己的生活背景，更顯示她有意識地試圖主動建構新的自我與身份，而不接受靜態的傳統婦女角色。《再生緣》的創作過程較長，使作者有機會記錄自己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與改變，更顯示生活經驗對作家創作產生的影響。作者在自敘中對家庭、親族的關懷也更明顯了。《筆生花》則將夾插自敘的傳統加以極端發揮，其記敘之詳之密，使得作者邱心如的自敘擦過婦女缺席的中國日記傳統，並且以純私密的個人世界，婉婉面對公眾性強的男性日記傳統。

由於彈詞女作家將自敘夾插在情節之間，所以讀者等於同時面對作者作為敘事者與女性個體的雙重身份，而由於寫作過程延伸甚長，所以所謂女性還包括女兒、姊妹、妻子、母親等各種人際角色。這些女作家寧可犧牲敘事的完整性，也無法抑制自己的「自傳衝動」，所以她們的身影永遠在文本中若隱若現，不時浮出表面，經由書寫而雕琢出自己的形神、建立自己的自我意識。而相對於自敘之日常性，小說情節卻敷衍著女英雄的探險故事，女主角暫

時捨棄甚至拒絕愛情與婚姻，在大世界中從事現實中不可能的大事業，將日常的瑣屑撇開一邊，把幻想發揮到極致。小說中的幻想，是女作家慾望的展現，也同樣在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女性主體，這女英雄的形象與作者自敘中面對真實生活的凡常女性彼此照應，也反映了女作家自傳在真實記錄與虛幻想像之間的存在。

1997年的〈晚清前期女性彈詞小說試探—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讀〉一文雖然以彈詞小說為處理的文本，但是在寫作時則是有意識地想藉之發展其他的關懷。本文主要有三條理路。第一項是對文學史上「晚清時期」如何分期的反省；第二項是討論晚清蓬勃的小說理論如何影響文學史的建構；最後則考察女性彈詞小說在晚清時期的發展，並且引申其潛在的政治意涵。就文學史分期觀念而言，筆者認為以梁啟超《新小說》創刊(1902)作為晚清的起點，雖然意義十分明確，但是顯然無法照顧到道光後期以至甲午戰爭這一段在小說史上似乎非常沈寂的時期。而事實上，這段看似沈寂的時光卻可能蘊含著強大的能量，為晚清的新舊交接與交融作準備。文學史家常以新、舊文學的分野作為晚清文學最大的特色，而本文則指出進化式文學史觀主宰了五四以來的晚清文學研究，因而忽略了新舊交雜時期的文學作品，亟需吾人重新思考。

晚清小說理論中，彈詞小說雖然集舊小說眾惡之大成，但由於其「婦女教科書」的地位，故仍然保有啓迪民智的價值。彈詞小說背負了新的道德使命，重新突顯了新、舊文學的衝突，使得後人輕易忽略了這一批「舊」作品在凝滯與沈悶中展現的「新」意。本文所處理的三部彈詞小說分別代表晚清女作家面對變局的三種嘗試。《榴花夢》以古喻今，極力溢美

女英雄，指涉十九世紀中期家國有難的挫折感。《精忠傳》將彈詞小說推向一向屬於男性的公領域。宋金相爭的主題出現在晚清，更留有無盡的詮釋餘地。《鳳雙飛》以新奇為目，專事對男性同性關係的摹寫。全書從內容到形式都洩漏了作者踰越規範的慾望。本文藉著對這三部彈詞小說的探索，思考晚清時期的舊女性如何利用舊形式創作，與興起中的新文學潮流接上樑頭，也與風雨欲來的現實宛轉對應。

筆者在1998年的〈由彈詞編訂家侯芝談清代中期彈詞小說的創作形式與意識型態轉化〉一文中，討論的時代又由晚清推回清代中葉，由觀察一位活躍於嘉慶年間的女性彈詞編訂家出發，探索彈詞小說的創作與閱讀跟意識形態建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市場價值與文學創作的互動。筆者在論文中尋求彈詞小說這種形式由表演轉化為文本的可能發展，從而論證彈詞小說創作因為特殊流傳管道而形成的「公眾性」意義。同時，筆者也將侯芝其人作為清代中葉一種「母教」典型的代表，藉由她對彈詞小說的態度，探討她的道德觀的養成以及其價值觀之呈現與傳播。這篇論文的起點雖然是彈詞小說的形式，但是對筆者而言本文其實有強烈的歷史感為背景。一方面侯芝個人在文學史地位的升降十分有趣，但更重要的是，她扮演的角色銜接了盛清時期以抒發自我為主的彈詞小說，以及晚清時期以教化婦女為主的彈詞論述。筆者在本文中首先試圖重新思考彈詞小說與實際演出及市場價值的複雜關係，繼而探索清代中期女作家侯芝的彈詞編訂事業以及其所反映的彈詞觀與時代思潮。彈詞小說雖然是案頭化的文本，也陸續出現典雅藻麗的作品，卻無法割斷與市井講唱的淵源，其出版與流傳的過程更與大眾閱讀市場息息相關。職此，吾人

對女性彈詞小說的研究，亦當在探討其內在之作者心志與情節人物之外，一併考慮時代思潮、文化網絡、乃至市場需求等相關外在因素。本文即在這種思索取徑之下討論清代中期彈詞編訂家侯芝的代表意義。出身於詩禮之家的侯芝懷抱正統思想，雖然由詩詞創作轉向彈詞小說，但一直堅守載道的文學觀，尤其對傳統婦德的闡揚更不遺餘力。因此，侯芝對稍早陳端生具有爭議性的彈詞作品《再生緣》懷有極為複雜的矛盾情緒。在寫作風格方面，侯芝強烈批判流行彈詞小說的情節結構、行文用語、結局安排等等，而她本人的作品則以情節新奇但文字平易為準則。凡此皆昭示了侯芝對大眾閱讀市場的關懷以及面對大眾婦女讀者所採取的教導者姿態。侯芝的個案不但代表女性彈詞小說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折，也有助於吾人對清代中期女性價值觀之養成以及其與文化市場之互動關係的觀察。

綜而言之，彈詞小說是中國古典敘事文學重要的一支，乃以韻文為主，散文為輔，源於說唱，而漸與小說合流的形式。在有清一代，此一形式對清代江南一帶女性有特殊吸引力，不但成為識字婦女的日常讀物，更造就了中國第一代女性小說家。因此，不論是就中國古典敘事文學的研究，或就女性與文學創作關係的探索而言，彈詞小說在清代的發展，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筆者因而一方面從事個別作品的解讀，一方面追溯彈詞小說的發展，同時也考慮此文類與清代文化其他方面的互動關係，期以多層次的角度，發掘此一文學史上沈埋已久的寶藏。筆者迄今的研究中，處理範圍包括彈詞小說與清代婦女的關係、彈詞小說讀者與作者的承續關係、創作與閱讀過程中行程的心靈溝通與認同感、女作家藉此形式完成自

我表達與主體性建立的問題等等。此數篇論文雖各專彈詞小說問題之一面，但背後其實有一整體考慮的支撐。蓋彈詞小說個別作者的創作精神、讀者的接受心態、政經社會的外緣影響、文學潮流與文類本身的內在發展、創作者與文學傳統之間的張力、以及讀者接受的美感要求等等因素，在在使得彈詞小說在清代呈現多樣的面貌，其中的每一個層面都值得專文探討，而唯有從個別問題出發，再輔以宏觀視野，才能逐步探索此文類的面目以及其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在時代發展上，筆者的研究也由清中葉跨越到晚清，並及當時的小說理論，在文類內部的發展之外，同時考慮歷史文化的脈絡，從而求得更有啟發意義的詮釋。



胡曉真

學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
學士(1986)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校區比較文學碩士(1988)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199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1995- 迄今)

總體經濟時間數列間之 恆定性與結構性變動

郭炳伸

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總體經濟時間數列多具有非恆定性質。恆定性質存在與否，關連著不同經濟理論的隱

涵。以備受爭議與討論的國民所得數列而言，若該數列具有恆定性質，則意味著造成該數列的衝擊(shock)只是短暫的，會隨時間而消弭於體系。反之，若驗證該數列為非恆定，則表示外來的衝擊對所得具有恆久性的影響，因而實質景氣循環(real business cycle)學派將可主張技術變動是經濟波動主要來源的重要證據。又若以實質匯率而論，該數列若呈恆定，代表著「購買力平價理論」獲得支持。該理論係許多國際金融模型的基本假設，或可視為長期均衡條件。數列的恆定性質與否，尚攸關經濟預測的準確性。若再以實質匯率為例，恆定性質的存在亦代表該數列具有可預測性，因為該數列終將回歸其長期均衡值。若不具恆定性質，長期預測該數列不具任何意義。凡此種種，引發晚近總體計量技術與理論的快速發展，而應用新的計量工具獲致的實證結果，連帶地也影響新的經濟理論發展。總體經濟理論與統計計量的相互激盪與提升，似乎罕見於過去任何一個時期。

檢定總體變數時間數列的恆定性，是總體計量理論與技術發展的焦點。傳統的檢定量多以「非恆定」虛無假設為出發點。但以「恆定」為虛無假設所發展出的檢定量，則似乎更符合古典統計推論精神。惟屬後者的現有檢定量，概都以Lagrange原則建構而成。至今以概似此建構而成的檢定量仍付之闕如。其理由在於，發展該概似比檢定量所需要的基本極限性質，由於其不屬於標準問題，一般理論未能適用，因而仍未被證明建立。但概似比檢定的優越檢力性質，使得建立這些極限性質成為必要。研究之一，即是在建立與推導這些極限性質，為建立以「恆定」為虛無假設的概似比檢定鋪路。這些性質包括，概似函數極大值的一